

服务经济博士论丛·第2辑

Doctoral Research Series on Service Economy · Series 2



The Study of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View of Industrial Relation

服务业发展论

——产业联系的视角

张月友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014037865

服务经济博士论丛 313 第2辑
Doctoral Research Series on Service Economy : Series 2



服务业发展论

——产业联系的视角

张月友 著



北航

C1725996

F719
313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服务业发展论：产业联系的视角 / 张月友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4

(服务经济博士论丛. 第2辑)

ISBN 978-7-5141-4387-4

I. ①服… II. ①张… III. ①服务业-产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0528 号

责任编辑：齐伟娜

责任校对：刘欣欣

责任印制：李 鹏

服务业发展论

——产业联系的视角

张月友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天猫网店：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1000 16 开 10 印张 190000 字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4387-4 定价：2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PAPD）、江苏现代服务业协同创新中心、江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江苏现代服务业研究院”的资助。

The Study of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View of Industrial Relation

经济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后在产业结构上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Fuchs 在其开创性研究著作《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 中如此预言：“起源于英国，随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的就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是一次革命；同样，起源于美国，就业从工业悄然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也将是革命性的。”如其所料，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已成为服务型经济国家。如今，发达国家 GDP 增加值和就业的 70% 已经由服务业创造，经济社会运行的关键特征也越来越表现为知识化、信息化和无形化。

对于正在全面走向基本小康社会和力争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大力发展服务经济的重大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制度创新的主要载体。无论是现代企业的产权体系和治理结构，还是现代市场体系的秩序和运作规则，或者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法制化和现代化，其实都是一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如创新赖以有效运作的知识产权制度，各类人才、技术、知识和产权等中介市场，财富驱动创新的金融制度安排，等等，无一不是属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内容。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服务业相对于非服务业尤其是制造业，是一种可贸易程度差、内需性强的产业，因此发展服务业事实上就意味着主要应开拓国内市场，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主要靠外需。中国经济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对应着国内巨大的、过剩的制成品生产能力。这些供给过度的制成品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由于可贸易的程度较高，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消化到了别国的市场。发展服务经济，不仅有利于缓解第二产业的竞争压力，减少资源、能源和环境的消耗，而且还可以利用其本地化、可贸易性差的特点，就地消化在本国市场，从而实现扩大内需、

降低国际贸易摩擦和转换发展方式。

第三，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关键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掌控着非实体的服务经济环节，如研发、设计、物流、网络、营销和金融等，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的低端为其进行国际代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努力往往被发达国家的大买家压制或者“被俘获”，很难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可以利用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动力，为制造业的起飞提供“翅膀”和“聪明的脑袋”，从而突破发达国家对于价值链高端的封锁。

第四，居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抓手。现今我国产业结构的重要特点是：与制造业供给严重过剩相对比，服务业许多行业的投资严重不足，产出尤其是高质量的产出处于严重的供给瓶颈，这就是所谓的“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制造业供给严重过剩要求我们在内需不足的前提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而服务业投资严重不足则是使人民生活和经济高速增长态势下感到不幸福、不和谐的主因。例如，绝大多数中国人始终生活在一种“求人”的状态，子女上学求人，看病求人，办事求人……这一切，其实反映的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如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不够发达”的现实，反映的是人民生活质量与经济增长严重不匹配。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态势和趋势，决定了还有太多的理论问题需要研究，还有太多的现实问题和政策需要评估和推敲。实践中，实现服务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路径、手段及政策工具尚不清晰，需要学者们投入热忱，潜心研究。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和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我国服务经济问题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先后出版或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服务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著作或论文。为了不断地培育我国服务经济学研究的后续新人，在上述两个机构的联合资助下，我们在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帮助下出版了这套以服务经济研究为主题的丛书。我们期待着国内外同行和各界人士携手共同对此开展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也欢迎广大朋友对丛书提出建议和批评！

21 世纪以来, 中国产业经济研究的两个热点尤为引人关注: 一是努力对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悖论做出解答; 二是着力论证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良性互动。但是, 这两个研究热点表面看似无关, 实际上相互矛盾: 一方面, 如果中国服务业发展确实落后, 它如何能够促进中国的快速工业化, 从而与制造业形成良性互动? 另一方面, 中国二、三产业间如果确实存在良性互动, 为何它无助于中国的经济服务化? 因此, 从产业关联视角考察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是本书主要任务。

本书第 2 章利用 OECD 数据库, 考察发达国家的产业关联现状和动态, 明确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基本关系, 并弄清产业关联对世界经济服务化所发挥的作用; 第 3 章利用中国历年投入产出表数据, 借鉴垂直专业化和进口分离的标准方法, 首次分离了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总关联和国内关联, 发现中国存在产业互促悖论现象, 也即, 在统计表现上, 伴随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关联强度日益增强,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不仅没有带来生产者服务业大发展, 反而严重抑制了本国服务业的比重提高, 这与世界的经济服务化和产业互促正相关规律相悖, 从而对中国的服务业发展难给出了产业关联视角新解释; 第 4 章和第 5 章分别从供给和需求视角构建数理模型, 探究造成中国产业关联失效和服务业发展难的发生机制; 第 6 章尝试给出逆向外包新概念, 论证了逆向外包是中国推行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一种经济全球化新战略, 并明确表明本书支持中国要主动扬弃出口导向型国家战略的政策立场。

本书有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 学者们在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上的分野, 是中国存在产业互促悖论现象在学术研究上各有侧重的反映。第二, 众多学者认为的中国产业间存在的良性互动, 是错误地使用了数据和变量的结果。过去, 学者们普遍使用包括了进口和出口的总投入—产出系数方法得

到的产业关联，只能反映开放型国家潜在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实际上，在统计表现上，包括了国内和国外关联的中国二、三产业总关联，远远大于剔除了进口中间投入作用的国内关联，而且，与总关联度超高并持续上升不同的是，中国二、三产业间的国内关联强度在时序上水平波动并呈下降趋势。第三，中国的产业互促悖论之所以发生，是由中国产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同步性造成。也即，制造业全球化的同时，服务业是本地化的，中国出口导向型国家战略割裂了二、三产业间的天然联系，造成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严重依赖于别国现代服务业的高度发展；最后，破解产业互促的中国悖论，要从促进中国产业发展的同步全球化想办法，这要求服务业对外开放。而通过逆向外包积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可能是弥补国内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人才短缺的一种服务业对外开放新战略。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导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 1	
1.2 本书的选题意义 / 3	
1.3 相关文献回顾及述评 / 4	
1.4 本书的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20	
1.5 本书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23	
第2章 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中的产业关联：现状与动态	25
2.1 导言 / 25	
2.2 文献回顾 / 26	
2.3 发达国家产业关联现状 / 27	
2.4 世界产业互促趋势和服务业发展 / 39	
2.5 本章小结 / 46	
第3章 中国的产业互促悖论 ——基于国内关联与总关联的分离	47
3.1 导言 / 47	
3.2 中国服务业发展概览 / 49	
3.3 我国产业结构与中间投入结构的变化 / 62	
3.4 我国的产业关联与进出口 / 65	
3.5 结论与建议 / 76	
第4章 我国工业对服务业的抑制机制研究 ——基于供给视角	79
4.1 导言 / 79	

- 4.2 相关的主要文献述评 / 79
- 4.3 替代弹性与我国劳动力流动 / 81
- 4.4 模型构建与均衡分析 / 84
- 4.5 实证检验 / 88
- 4.6 结论与建议 / 91

第5章 我国工业对服务业的抑制机制研究

——基于需求视角 95

- 5.1 导言 / 95
- 5.2 两部门模型 / 98
- 5.3 消费者偏好影响部门就业转移的若干讨论 / 103
- 5.4 实证检验 / 105
- 5.5 结论与建议 / 111

第6章 逆向外包：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一种新战略 114

- 6.1 导言 / 114
- 6.2 逆向外包概念 / 117
- 6.3 逆向外包的驱动力 / 120
- 6.4 中国开展逆向外包的条件 / 123
- 6.5 逆向外包模型 / 124
- 6.6 本章小结与政策启示 / 134

参考文献 137

后 记 150

第1章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相关研究越来越多, 其中有两个表面看似无关却相互矛盾的研究热点: 第一, 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 (江小涓、李辉, 2004; 裴长洪、夏杰长, 2005; 白重恩, 2007; 江静、刘志彪, 2009);^① 第二,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良性互动 (李江帆, 2004; 陈宪、黄剑锋, 2004; 韩德超、张建华, 2009; 高觉民, 2011)。其实, 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服务业由于本身特性所导致的比重提高, 如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强、需求收入弹性高等; 间接原因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与制造业部门间的强依赖关系有关。一方面, 伴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深, 产业间的彼此依赖加强了, 工业化对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需求增加了; 另一方面, 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公共/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因此, 如果认同中国服务业落后, 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存在强烈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无法理解的; 而如果认为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确实存在积极互动, 为什么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只能长期维持在 40% 左右, 直到 2010 年仍然只有 43.1%? 与发达国家相比

^① 关于中国的第三产业是否落后也有不同声音, 代表性观点有三类: 一是以岳希明、张曙光和许宪春为代表的统计误差低估论 (岳希明、张曙光, 2002; 许宪春, 2004); 二是以魏作磊为代表的发展阶段正常现象论 (魏作磊、胡霞, 2005); 三是以李钢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例过高论 (李钢等, 2011)。

较，这个比重至少低 30 个百分点，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低了 15%，相对于 2009 年的 43.3% 更是不升反降，我国服务业的长期落后状态为什么并未因为与制造业间的良好互动而改善？这种对转型期中国产业发展现状认识上的“矛盾”，即使在同一学者的研究中也常有体现，如郑吉昌既相信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内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郑吉昌，2003），又肯定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郑吉昌，2003，2004）。

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分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在解释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时，一方面，众多学者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原因的解釋还停留在传统的需求偏好假说和政府作用层面上；另一方面，一般而言，只有到了工业化中期，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良性关联关系这种内生性力量才会上升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而学界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尚有分歧。因此，众多学者在解释我国服务业落后原因时，忽视了对产业间互动视角的探究。笔者认同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①我国服务业落后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在第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我国的全球化是以不适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GVC）底部，制造业全球化的同时，服务业是本地化的，二、三产业间本该有的内生性良性互动被人为割裂了，从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实际上对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起到了抑制作用。在论证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时，后一研究不仅未将其纳入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来综合考察，也错误地使用了数据和变量。也就是说，学者们在论证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时，普遍使用的是包括了进口和出口的总投入—产出系数而非国内投入—产出系数的方法，基于此所测算出的产业间关联只能反映潜在的服务业（中国和国外之和）与制造业的互动，而非我国国内产业间的实际互动。这种被错误论证的潜在的产业互促，实际上证明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制造业的发展牺牲了本国资源，拉动的是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满足的其实是发达国家的需求。说明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以牺牲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前提，而我国的“世界加工厂”地位也是建立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者服务业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的非一体化基础之上。如果再考虑我国工业化动态过程，产业间关系也会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加入全球化方式发生

^① 根据钱纳里和塞尔奎因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进入工业化后期的标志为：以 2005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衡量，人均 GDP 超过 11 170 美元；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小于 10%，就业的比重在 10%~30%；工业比重仍然高于第三产业，城市化水平为 60%~75%。而这些指标，在 2011 年的中国为：以 2005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 GDP 约为 7 417.9 美元；核实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产值比重分别为 10%、46.6% 和 43.4%；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 34.8%、29.5% 和 35.7%；城市化水平首次突破 50%，为 51.27%。

变化。

综上,本书从产业关联视角解释中国服务业落后,并考察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实证在出口导向战略下,中国以承接FDI 和国际代工为主要特征加入全球化的方式,一手抓制造业,一手抓服务业,对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路径造成的影响,以期对产业升级、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加快经济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1.2

本书的选题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为什么发生一直是学界未解的难题,特别是在我国对内亟待发展方式转型、对外净出口持续低迷的今天,破解这个难题不仅关乎服务业本身的发展,也是关乎我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现有的解释主要有需求论、供给论和组织变革论等,这些理论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无一触及问题之根本。从产业关联视角重新探寻阻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有可能真正剔除长期困扰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最重要羁绊,因此,本书是对现有解释服务业发展落后原因的重要补充。

传统的产业关联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产业间的关联不断增强,产业结构不断软化。其实,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全球化成为一把双刃剑,在考察产业关联时应综合考察全球化对其的影响。如今,一国的工业化所需要的几乎所有投入,都可以便捷地在全球进行采购,一国产品的生产也可以极大地分割到全球进行生产。这样,外向型经济国家表面的产业关联互动,实际上包括的是潜在的产业关联互动。如果以不适当的方式加入全球化,一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间表面的强关联,可以只反映本国制造业与外国服务业的强关联,甚至可以致使本国产业结构硬化。因此,本书也是对传统的产业关联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2.2 现实意义

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11 年我国贸易顺差 1 551.4 亿美元,比 2010 年净减少 263.7 亿美元,贸易顺差继续收窄,继 2009 年后,2011 年我国净出

口对国民经济贡献再次为负。一段时期内,鉴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深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美欧经济萧条,增长乏力,期望通过“再度工业化”重回实体经济的愿望强烈,净出口对我国经济贡献为负将成为常态,我国进入外需疲软时代将成为不争事实,我国依靠外需的全球化战略迫切需要进行调整。另外,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如资源短缺、劳动力和资金成本上升、环境承载力下降、就业紧张等一系列问题愈演愈烈,迫切需要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升级来解决。而决定服务业发展和经济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随工业化阶段不同而不同。一般来说,在工业化初期,经济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上升主要通过“去农业化”实现,在此阶段,服务业比重因农村城市化导致城市的临时部门供给增加而上升;到了工业化中期,服务业的发展则主要受服务业与经济其他部门的网络关联影响,特别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良性互动上升为主要因素;只有到了工业化后期,特别是后工业化阶段,各产业本身的特性才会成为主导性力量,导致“去工业化”,最终实现经济服务化。而如果以人均 GDP 指标、城市化水平和就业结构指标为主要依据,以工业产出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两个指标为辅助依据,来判断我国工业化进程,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中期。^① 可见,本书研究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恶化和所处的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现实需要,对中国扩大内需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且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3

相关文献回顾及述评^②

与本书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探寻世界经济服务化或者中国经济逆服务化原因的相关解释,这既包括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的相关争论,也包括探寻发达国家服务业增长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还包括,解释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的诸多努力;另一类文献涉及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关联关系的研究。

^① 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有不同认识:官方机构,譬如工信部和统计局认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而一些研究机构和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

^② 本节部分内容的早期版本以《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与我国服务业发展》为题发表在《财经科学》2012年第10期上,感谢《财经科学》相关老师和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

1.3.1 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争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成为实现经济服务化的国家。富克斯(Fuchs, 1968)在对服务业进行开创性研究的一部名为《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的书中如此预言:起源于英国,随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的就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是一次革命;同样,起源于美国,实际上在各发达国家也能观察到的就业从工业悄然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也将是革命性的。果不其然,按照OECD(2000)数据,1998年各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美国为73.8%,英国为71%,法国为70.7%,澳大利亚为69%,奥地利为63.9%,比利时为71.9%,加拿大为73.8%,捷克为52.3%,丹麦为70.8%,芬兰为64%,德国为62.1%,希腊为56.4%,匈牙利为58.5%,爱尔兰为61.5%,意大利为64.1%,韩国为60%,卢森堡为72.7%,荷兰为71.6%,新西兰为67.3%,葡萄牙为55.3%,西班牙为63.2%,瑞典为72.9%,瑞士为63.2%。足见,以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达50%以上为衡量标准,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成为了服务型经济国家。

如今,发达国家增加值和就业的70%已经由服务业创造,经济社会运行的关键特征也越来越知识化、信息化和无形化(Maroto-Sánchez, 2012),但这是否表明服务业经历了真实增长以及是否应该因此重视服务业发展呢?对此,仍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以鲍莫尔等(Baumol et al., 1991)、鲍莫尔(Baumol, 2001)、萨莫斯(Summers, 1985)等为代表,认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上升其实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提高,如果换用不变价衡量,服务业相对比重不变甚至有轻微的下降;第二种以舒尼(Gershuny, 1977)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彻底否认服务业增长,他们认为所谓的经济服务化只是高赋税福利国家的神话,实际上,只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时错误地对服务业进行定义导致的统计假象,如果使用最终产出而不是按工作属性来分类衡量服务业,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Jansson, 2009; Gundlach, 1994; Hammes, Rosa and Grubel, 1989);第三种以阿克赫斯特(Akehurst, 2008, 1989)为代表,他们继承了斯密(Smith, 1776)的服务业属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保守思想,认为服务业本质上属于寄生性产业,尽管其有助于实现其他产业的经济价值,但其本身并不创造任何财富,甚至,直至今日,服务业的无形性、异质性、不可储存性、不可复制性和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等固有特征,仍然并不真正为人所理解(Peck and Tickell, 1991; Akehurst, 2008, 1989)。

第一类否定服务业增长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上升其实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提高。但是，这无法排除因大量服务业不可测量而可能发生低估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对大量无形要素及其产出的重新定义和测量方法的开发与改进，近期有关服务业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伊列雷斯（Illeris, 2005）论证了服务业对总 GDP 的贡献确实随时间不断增长；斯科特凯特与尤卡里尼（Schettkat and Yocarini, 2006）认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兴起既非价格效应，也非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所致，而是由家庭服务的不断专业化、市场化带来，发达国家的就业向服务业转移确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转移。

第二、三类否定服务业经历了真实增长的经济学家们，一些过于极端，另一些较为保守。对于这些不尊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现实并刻意轻视服务业发展的陈旧观念，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 2005）辩驳道：服务业其实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将服务业简单分成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两大类，这一点不难看到。前者的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革命说到底也是一种发生在生产者服务业的现象；即使仅看消费者服务业，将如今的沃尔玛公司或相似规模企业与 300 年前的夫妻店同样服务消费者的效率比较一下，其惊人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显而易见。

可见，虽然对服务业发展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发达国家的财富创造，确实已经由对有形产品生产的依赖，加速向技术研发、知识创造以及其他无形资产与离岸服务外包的依赖转变。毋庸置疑，当前，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创新源泉。

1.3.2 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的传统解释和最新进展

尽管服务活动主导发达国家部门结构，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已是不争事实，然而，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化”的动因，一直是经济学家和史学家们兴趣盎然的重要研究课题。按照出现早晚，可以将解释服务业增长的主要文献归为四大类：收入增长论、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论、产业关联论和其他因素论。

1. 收入增长论

收入增长论也被称为需求偏好假说^①。从最终需求角度解释服务业增长的

^① 笔者认为相对于需求偏好对最终消费服务的动力作用，收入增长是更为被强调的动力因素。

先驱是克拉克 (Clark, 1957), 他和费希尔 (Fisher, 1935) 率先使用恩格尔定律来研究消费者需求, 认为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 并据此认为,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消费者的总需求结构中, 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比重下降, 服务业比重上升。后续的很多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支持, 如: 横截面上进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业水平比较时, 相对于穷国, 富国服务业的产值、就业比重确实更高 (Samuelson, 1964; Bhagwati, 1984a、1984b; Francois and Reinert, 1996)。时间序列上,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一国服务业比重确实也稳定上升 (Appelbaum and Schettkat, 1999; OECD, 2005)。

但是, 随着人们对服务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 收入增长论遭受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1) 萨莫斯 (Summers, 1985) 基于横截面数据, 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服务业支出比重的关系, 发现, 以名义价格衡量的服务业比重与收入水平之间虽然呈正向关系, 但以购买力平价表示的各国服务业实际产值比重几乎不变; (2) 梅西纳 (Messina, 2005) 发现: 横截面上观察, 各发达国家间收入水平相似, 经济服务化程度却差异较大, 对此, 收入增长论束手无策。因为, 没有理由可以认为相同收入水平的不同国家消费者偏好结构会不同。而且, 如果考虑到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相对价格, 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对服务业发展的正向效应, 能否抵消需求价格弹性的负向效应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3) 舒尼 (Gershuny, 1978) 和腾亚和斯科特凯特 (Ten Raa and Schettkat, 2001) 甚至发现与收入增长论相反的现象: 前者调查了英国 6 年的家庭预算情况, 发现, 由于家用电器对人工服务的替代作用,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英国在这些年份中的个人服务消费反而下降了; 后者发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轻微地下降, 对服务业的需求却一直稳步增长。

当然, 除此之外, 收入增长论暗含的两个假设也备受诟病: 一是假设服务业全部由最终消费服务组成, 明显忽视了作为中间投入要素投入到产品和投资的那部分服务业作用, 也明显与实际生活中很多服务业作为中间服务, 投入到其他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中去的不符; 二是收入增长论将服务业作为一个统一的大类考虑, 并与非均衡增长理论假设一致, 同样认为相对于制造业, 服务业生产率较低, 而实际上, 服务业各细分行业性质迥异, 很多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率并不低。

2. 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论

从供给层面寻找服务业扩张的决定因素, 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富拉斯蒂埃 (Fourasti'e, 1949) 的研究, 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 随着收入